

桂崇基英文原著
沈世平譯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桂崇基英文原著

沈世平譯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民國十一年—三十八年)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四版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平裝一冊基本定價壹元伍角正

(郵運滙費另加)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本書局 登記證字號 印刷者 發行處

桂 崇

沈 世

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熊 生

熊 鈍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

臺業字第捌叁伍號

臺灣中華書局印刷廠

臺 灣 中 華 書 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郵政劃撥帳戶：三九四一一號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94, Chungking South Road, Section 1,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No. 7641

臺參(實)

(臺總) 平甲書

著者桂崇基先生江西貴谿人，公曆一九〇〇年生，歷任大學教授，校長，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

重要著作有：

政治學原理

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政治學

民國五十四年正中書局印行

政治思想之問題與趨勢

民國五十九年商務印書館印行

Chung-gi Kwei, *The Kuomintang - 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

1922-1949.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Netherlands, 1970

四 版 序

茲值本書第四版即將付印，我願乘此機會說幾句話。

本書韓文版譯者張公子博士最近致友人書，曾說：「故朴總統也曾看過這本書，還收到他的感謝信呢！」又說：「我們學術界與國家機關人員都很重視桂先生寫的大作，我們對北韓談判也以此書作為參考。」

本書日文版亦即將問世。

我們希望亞洲甚至世界各國人士都會詳細研究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談判經過，以資借鏡。

桂崇基 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

三版序

初版未久，迅即再版，今再版又已售罄，不得不印三版。倘非某書局翻印，以社會上所流傳數量而言，必已超過三版很多了。

再版匆促，今值三版，略有增刪，並願藉此機會，稍抒個人感想。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合離事蹟，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都佔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中國竟無一本著作會將其本末詳細寫出來，局部的，片段的，不能說沒有，但從容共一直道和談，源源本本寫成一本書的，似尙未見，而本書就想彌補此種缺憾。關於此點，在英文原著序文中，曾略一提及，今重申此義，無非想促起世人注意罷了。

本書所記張學良與中共暗中往來經過，其中一部份資料，係取自張學良本人所撰反省錄。在我起草此書的時候，其反省錄尙未正式公佈，故將此段經過列入附註。民國六十三年，反省錄正式公佈，故今日將其移入正文。

張學良回憶說：「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財政部公函見良，要求進入匪區。」此人我在第六章明白指出爲張冲。

關於南昌暴動，或有人指爲俄國顧問所策動。但根據張國燾回憶錄，則適得其反，俄顧問派其趕去南昌制止此一暴動，適國燾到南昌，暴動已經發動了。真正策動南昌暴動者爲周恩來。故在三版中爲之更正。

類此情形，尙有數起，爲節省篇幅，恕不一一縷述，尙希讀者注意及之。

桂崇基

民國六十七年十月

序

桂崇基先生近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 民國十一年—三十八年」一書，自在歐洲出版後，殊爲國際間所重視。外國大學採爲參考書者固多，西文書刊予以好評者尤不少。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合離事蹟，中外書籍之真能詳道其本末者猶未一見。近年來美國研究中國之書籍固已不少，然多爲有關大陸者。故此書之出，實可彌補此一缺憾。

據著者在序文中所言，渠早歲一度曾參與其事，故國、共初期合離之演變，知之頗詳。中國共產黨之發起人如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皆爲其所素識，亦曾交換意見。除此之外，或從外國政府檔案，或從私人談話，所得資料，更爲外間不易羅致者。即以中山艦事變而論，原來計劃本欲劫持蔣校長赴俄。其一次面詢，三次電話問蔣校長行止者究爲何人，蔣校長從未宣佈，久久成爲疑案。著者乃從當時擔任蔣校長之機要秘書陳立夫口中，得悉實爲汪兆銘之妻陳璧君所爲，代接三次電話者即爲陳立夫。疑團乃釋，從而得知蔣、汪間關係演變之真實原因所在。中山艦事變雖經平定，但對國、共間之關係，影響實大，故有整理黨務案之提出。凡此皆非深知內情者，不能道其原委。細讀全

書，類此事例，不勝枚舉。譯者從多方查證，深覺其一字一句必有來歷，而於其本末源流，以及雙方所持立場，所陳理由，尤不憚煩予以敘明。故特予譯出，以供留心中國近代史者之參證。

沈 世 平 謹識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目錄

序

第一章	中山先生爲什麼會聯俄容共	一
第二章	第三國際爲什麼命令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	一六
第三章	容共後之中國國民黨	二五
第四章	清黨與分共	五〇
第五章	中共武裝暴動與流竄	七〇
第六章	國共直接商談——抗戰前夕及抗戰期中	八五
第七章	美國調停與政治協商會議——抗戰勝利前後	一〇一
第八章	和談——李宗仁代總統期間	一三五

第一章 中山先生爲什麼會聯俄容共

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畢生致力於國民革命，以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辛亥（一九一一）以前，他用全力以推翻滿清，人民感於清廷喪權辱國，激於民族大義，羣起響應。繼至武昌起義，不數月，便將數千年君主政體，一旦推翻，建立民主共和國。

袁世凱初以贊助共和姿態出現，繼則陰圖復辟，帝制自爲。雖不旋踵，由於全國軍民之反對，袁氏帝制迷夢，即歸幻滅。袁倒而繼起之北洋軍閥集團，又復割據稱雄，魚肉人民，互爭權力，國危民困，有加無已。國號雖更，毫無民國氣象。故自民二（一九一三）以後，中山先生又用其全力以打倒軍閥。

惟中國人民習於數千年之專制，對於軍閥之爲害，遠不若民族大義之易於激發同仇。而列強心目中亦以維持現狀爲政策。故對中山先生之主張與抱負，可有國際間私人學者之同情而難獲其政府之支助，甚且遭其干擾。所以終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而未能及身展其建國偉抱。惟其主義之號召，人格之奮鬥，已引起中國儒林之共鳴。南北人才薈粹其旗幟之下，願爲效命。是其領導之影響力，則已深入人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勢力，已退出中國，蘇聯其時忙於國內問題，無暇東顧

，法國亦正力圖恢復本身元氣。而在中國最爲活躍者，厥爲英日兩國。日本在關外則支持張作霖，關內則支持段祺瑞。英國勢力範圍伸展沿長江流域乃支持吳佩孚。張、段、吳倚兵自重，形成最具勢力之三大系統。美國對華政策，素抱正義，抑制侵凌，惟受英國影響，亦持左袒吳氏態度。

中山先生當時外交眼光，早已重視美、英、日三國之關係。縱不冀其作極大之支助，亦冀有以釋其疑懼，減少其外交上之阻力。正如美國獨立戰爭之外交動向，華盛頓聯法以制英，以及其南北戰爭，林肯則設法阻止英、法兩國出面干涉，同一抱負。中山先生對於美國之希望，尤爲殷切，認爲：「美國之地，雖與我隔，而以其地勢，當然不侵我而友我。況兩國皆民國，義尤可以相扶。中國無發展之望則已，苟有機會，必當借資於美與日本。無論人才資本材料，皆當求之於此兩邦……於美國，以政治論又爲師弟之邦。」⁽¹⁾

但事難預期。當時傳聞美國政府，將對中國南方護法政府施用壓力，冀其放棄護法主張。中山先生乃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十九日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申述北京政府解散國會之非法，以及南方政府護法之經過。繼謂：「北京官吏正式傳出消息，謂如南方政府不接受其條件，則將促請美國政府對南方政府施用壓力，以終止內戰云云

。茲爲正義、民主、以及爲中國和平，特以個人名義聲明吾人和平條件之立場。吾人唯一條件，即國會必須能完全自由行使其職權。」

觀此，措詞指歸，持理甚正，並無希冀。威爾遜將此電批交國務卿藍森 (Robert Lansing) 辦理，批云：「我不願與孫逸仙直接通信，縱然我有時同情他所宜稱的主張與目的。請即提供意見，爲感。」藍森簽覆如次：「批擬覆孫逸仙來電敬悉，經逕令總領事非正式告以致美總統電業已收到，將予以適當之注意。余對此君，此時不欲作進一步之表示……其對中國目前將再有任何真正影響力，亦尙存疑。(2)」

中山先生當不知其簽擬內容，唯中山先生之在中國，畢竟爲開元第一任總統，似此措置，藍森實應負責。此亦證明其對中國社會觀察尙不夠深刻，僅從現實外交慣例上着眼，似究失之輕率。作者得親睹此項原稿，頗費周折，深表驚嘆。(3)

中山先生對日，素主中日兩國携手合作，共圖大亞細亞主義之實現。曾謂：「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爲存亡安危兩相關聯者……爲兩國謀百年之安，必不可於其間稍存芥蒂。……日本與我同文同種，其能助我開發之力尤多。必使兩國能相調和，中國始蒙其福，兩國亦賴以安，即世界之文化，亦將因以大昌。(4)」這是中山先生爲中日兩國所籌謀的百年大計。但日本舊派武人猶圖以武力傾覆民國。而中山先生則以民國之嫖姆自任

，於民國六年致書日本寺內正毅會說：「在此時期，貴國能協助主持正義之一方，使其革新，遂行無阻，自足收永遠和平之效，而人民亦感激了解貴國之誠意，親善之實自舉。」(5)其嚶鳴求友之心，情見乎詞。中山先生一再勸告日本當局勿「以圖近利爲旨」，「勿惟以武力優者爲友。」(6)均未能促其接納。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九月日本山本權兵衛內閣成立，犬養毅任文部大臣兼遞信大臣，他是中山先生之老友，對於中國之革命事業，貢獻很多，可稱志同道合。喜其參加日本內閣，具有影響對華外交政策之潛力。會於是年十一月十六日以親筆長函託人面致犬養毅。時中山先生方任南方政府大元帥，正事聲討曹錕賄選竊國。特於函中鄭重指出：「日本政府此時應毅然決然以助中國革命之成功，俾對內可獲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而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則日支之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可保……如百年前英國之助西班牙，如近日美國之助巴拿馬方可……」(7)惜山本內閣對中山先生之意見未盡同意，故犬養毅亦置此函未覆。越一年，中山先生取道日本北上，主要亦欲面詢犬養毅意見。蓋聯俄之後，孫先生仍望能得日本之協助。

在第一次大戰前，英國爲列強之首，殖民地遍全球，因有英國國旗無日落之稱。中國之被侵略亦以英國之推銷鴉片爲啓禍亂之源。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山先生在其所

著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中，即會預言一旦大戰結束，英國在和會上必將以中國為犧牲品，後不幸而言中。廣東在地理上的關係尤常與香港政府發生齟齬。中山先生抱與人為善之旨，屢欲改善雙方政府間之關係。民國十二年（一九三三）二月間廣東省長胡漢民派廣東交涉員兼外交部秘書傅秉常赴港訪問。當時，傅氏銜命赴港，並未攜帶任何具體方案，僅作口頭上之親善，表示粵港地接比鄰，關係密切，應能雙方瞭解，避免隔閡，至於中英兩國整個外交關係，則可留待將來計議。香港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Stur-bbs）頗趨其言。嗣中山先生於二月十七日由滬赴粵途中，抵達香港，得與司徒拔洽談甚歡。英國殖民部亦贊成此議。惟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則持反對態度。因朱之反對，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傑梅遜（Sir James Jameson）遂從中作梗。英制，有關外交事務，外務部的權力超過殖民部。故聯英之議，亦終無成。此事之經過係傅秉常親告作者，當非虛語。

中山先生在聯美、聯日、聯英各種試探，各種努力，滿懷熱望，均被拒於千里之外的時候，而另一隻援助的手，却從另一個千里之外突然伸來——那就是俄國的。(8) 蘇俄於一九二〇年宣佈放棄其在帝俄時代與中國訂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中東鐵路，退出外蒙。當時中國國民對於蘇俄之友好態度，遂寄予無窮之希望。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十二月，中山先生師次桂林，籌備北伐，第三國際代表馬林（Maring）馳謁孫先生於軍次，即提出三項建議：（一）改組國民黨，聯合社會各階層，尤其是農工大衆；（二）創辦軍官學校，爲建立革命武力之基礎；（三）國、共兩黨合併（amalgamation）。中山先生未予具體答覆。馬林第二次晉謁中山先生，在座者有胡漢民、許崇智、陳少白、鄧家彥、曹亞伯、林雲陔、朱卓文、李祿超、孫科諸人，馬林尚促國民黨與第三國際聯盟（alliance）。中山先生願謂諸人曰：「諸同志有說乎？」衆默然。中山先生乃鄭重答覆曰：「蘇俄革命甫四載，其事蹟世罕能言者，文獻闕然，莫由聞知也。吾儕革命黨人也，詎不同情革命？顧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不通。故共產之在俄行之，而在中國斷乎不能。况吾師次桂林，志在北伐。今吳佩孚屯軍洞庭以逆我。吾奪洞庭，窺武漢，直取長江，而長江流域爲英國勢力範圍，英若知我聯俄，必懷忌恨，力圖遏我，以助直系。北伐之師，從此殆矣！爲安全計，今僅能與蘇俄作道義上之聯合。一俟義師北指，直搗幽燕，再謀具體合作，未爲晚也。」（9）此爲中山先生謝絕馬林之詞。中山先生對革命事業百折不回，而其外交觀點則重道義基礎，無間險夷，非如藍森在覆威爾遜函中所作之誹謗，指爲「待價而沽」者。

迨陳炯明叛變，中山先生走滬。盱衡局勢，知陳不足平，惟鑒於陳炯明之變亂，更

涉想武夫軍閥之不足恃，以其無主義之認識爲思想之主宰，易受利誘，難供驅策，以圖北伐之順利完成。於是回溯馬林創設軍官學校之建議，誠有必要。惟重建革命武力，則所需於蘇俄之處爲械彈，軍事顧問。此二者彼此易商。倘蘇俄以實行共產主義相要則將如何，此最爲困擾之重大問題。

適蘇俄代表越飛 (Adolph Joffe) 由北京先派一軍事隨員來滬，詳詢軍事情況，策劃合作進行。不久滇桂軍回師廣州，驅逐陳炯明，粵局粗平。越飛本人已由北京來滬與中山先生進一步洽談合作。越飛鄭重表示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乃爲協助中國國民革命之成功。並說明中國祇宜實行孫博士的三民主義，絕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即蘇俄實況，亦非實行所謂共產主義。一二百年後，共產主義能否在蘇俄真見實行，亦屬疑問。越飛一席話，使中山先生素所橫梗於胸中疑慮，渙然冰釋，遂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一月二十六日與越飛發表共同宣言如次：

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